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
——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On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唐艳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
——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On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Of Shui

唐艳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唐艳芳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9-07956-2

I. 赛… II. 唐… III. 水浒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I207.412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972 号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

唐艳芳 著

责任编辑/林骧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0 千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956-2/I · 600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范围内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和需求也呈加速上升之势。顺应这一形势,我国自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启动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大力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和汉籍外译事业的发展。从目前来看,这一战略可谓成效卓著: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在全球 88 个国家(地区)建立了 282 所孔子学院和 272 个孔子课堂,为当地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汉语教师,也大大增进了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汉籍外译方面,1995 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截至该文库全球首发的 2007 年 1 月,共推出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英译 51 种 92 册,计 5800 余万字,文库计划中的其余 54 种古代典籍,以及中国近代和现当代文学名著的外译工作,亦已拉开序幕。在此背景下,国内译界近年来掀起了中籍外译研究的热潮,出版、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也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博士论文,对中籍外译中的译者、选材、策略、接受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有意义的探索。唐艳芳博士的新作《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就是其中一部富有理论开拓精神和实践借鉴价值的研究成果。

赛珍珠是一个在中美两国都曾颇有争议的人物,文学文化领域如是,翻译研究领域亦如是。自 1990 年代初以来,随着国内外一系列旨在“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赛珍珠的学术活动的开展,作为作家、社会活动家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赛珍

珠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甚或激赏,但作为翻译家的赛珍珠的地位与贡献却迟迟未获认可。这中间既有历史原因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有传统翻译观和翻译研究方法导致的对其翻译策略的片面认识,但无论何种原因,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赛珍珠翻译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水浒传》赛译本的真实面貌等,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和客观的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作者的这一研究选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赛珍珠研究的内容与范围,更为翻译研究领域重新认识和评价赛珍珠奠定了基础。

就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言,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大亮点:

其一,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作为20世纪最具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之一,后殖民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并非铁板一块的僵化理论,其着眼点随着历史、地域、文化身份、政治等因素的演变,已从最初对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关注和批判,发展成为一种集多种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于一身、表现出“大理论”和“大叙事”特征的理论体系,近年来在文学、文化、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书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并对其适用性作了探讨和论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以清醒的眼光,对后殖民理论的利弊得失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并在赛译《水浒传》的译者研究和翻译策略研究中一直坚持这一客观公允的立场,从而使研究结论令人信服。这是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借鉴理论视角时应大力提倡的一种态度和做法。

其二,历史的态度和深入的文本研究。如前所述,译家赛珍珠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及赛译《水浒传》真实面貌的长期蒙蔽。本书在这两方面均有突破。前者主要见于译者主体行为研究。作者对赛珍珠翻译动机的剖析,并不是人云亦云或主观臆测,而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依据大量的文献或史料,力图真实地再现赛珍珠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行为及其背后复杂

乃至矛盾的动机,既不刻意为其翻译“翻案”,也不刻意为尊者讳。后者则主要见于翻译策略研究。作者从词、句、篇等三个维度入手,采取全文检索与取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赛译《水浒传》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并借助包括语料库在内的工具或手段进行了言之有据的分析和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文本研究不仅涉及赛译本和其他两种英译本,而且在原文版本的考证上也颇下了一番工夫,这是很多中籍外译研究者容易忽略或很难做到的,从而使本书的研究更富学理厚度。

其三,对赛译《水浒传》当下意义的挖掘。作者除了花大力气研究译者主体行为和翻译策略,还专辟一章探讨了赛珍珠翻译的文化价值和翻译伦理启示,尤其是对当前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借鉴意义。这使本书除了厚重的学术价值之外,又有了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因为中籍外译研究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即在于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智力支持;而且,从前人的实践中提炼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有启发意义的经验,既是学术研究自身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理论指导和促进实践的现实需要。因此,对赛珍珠翻译的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上的考虑,更应关注其对当前汉语国际推广的方法论意义;本书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反映了作者开阔的研究视野及学术研究中的现实与人文关怀。

我与艳芳相识于2005年秋。当时他来华东师大访学,期间我们多有交流,印象中他为人谦虚,治学严谨,学术基本功扎实,文字功底也不错。第二年他通过了入学考试,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艳芳勤奋好学,涉猎甚广,且敏于思辨,许多问题稍加点拨即融会贯通。他入学之时主持着一项浙江省教育厅课题,其中涉及《水浒传》的英译,在研究过程中对赛译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希望博士阶段对其作深入研究。我对他的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经过三年的努力,克服了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艳芳交给了我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其博士论文不仅论述缜密、求证严谨,而且行文流畅、格式规范,赢得了评阅专家和答辩

委员会的一致好评。更令我高兴的是,他发表的前期研究成果和完成的博士论文均已获得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可和好评。作为导师,自己的学生能有此作为,实乃快事一桩!现艳芳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即将付梓,嘱我为序一则,遂欣然提笔,为其学术道路上的成长与进步击节喝彩!

张春柏

2010年12月

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内容	8
第三节 研究基础	12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4
第五节 研究范畴	15
第六节 本书框架	17
第二章 赛珍珠研究历史的回顾	19
第一节 1930 年代—1940 年代中期:争议中的肯定 ...	19
第二节 1940 年代末—1980 年代中期:敌视与冷落 ...	28
第三节 1980 年代末以降:“重新发现”与“历史地 评价”	34
第四节 近年赛译水滸研究述评	43
2.4.1 立论基础	45
2.4.2 论证方法	46
2.4.3 理论视阈及文本研究	47
本章小结	55
第三章 后殖民理论概述	56
第一节 后殖民理论的定义与内涵及适用性分析	58

第二节 后殖民翻译理论核心思想述评及适用性分析	67
本章小结	78
 第四章 主体“在场”: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探析	80
第一节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	80
4.1.1 译者主体性的定义与内涵	81
4.1.2 神权与形而上学支配下的译者主体	84
4.1.3 解构主义及后殖民理论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	89
第二节 赛译水浒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101
4.2.1 赛珍珠的文化身份及其影响	102
4.2.2 翻译选材的主体性	108
4.2.3 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	122
本章小结	133
 第五章 和而不同: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策略对差异的追求	135
第一节 “拥抱异化”——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	136
5.1.1 异质话语:翻译的差异性本质	137
5.1.2 消解中心话语霸权:陌生化翻译的终极目标	140
第二节 赛珍珠《水浒传》英译的陌生化策略表征	141
5.2.1 词语表征	142
5.2.2 句法表征	185
5.2.3 篇章话语表征	213
本章小结	225

第六章 赛珍珠翻译策略的意义与启示·····	227
第一节 差异性与多样性诉求的文化价值·····	227
第二节 翻译伦理意义·····	231
第三节 对当前汉籍外译工作的启示·····	236
本章小结·····	243
第七章 结语·····	244
第一节 本书主要发现与研究结论·····	244
7.1.1 关于赛译水浒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44
7.1.2 关于赛珍珠在翻译选材与翻译 · 过程中的主体性·····	245
7.1.3 关于赛珍珠的翻译策略及其价值 与启示·····	248
第二节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249
第三节 后续研究设想·····	250
参考文献·····	252
附录一·····	274
附录二·····	278
后记·····	29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获奖的作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在中国成长与生活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双焦”的独特视角,一方面为她积累了重要的创作素材,并帮助她赢得了辉煌的文学声誉,另一方面却又使她的文化身份屡遭质疑,其在中美两国的接受与认同(从20世纪30年代的蜚声中美乃至世界文坛,到20世纪40—80年代的“销声匿迹”,再到最近20年来的“重新发现”),也戏剧般地随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与谅解而大起大落。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冷战”思维的摒弃和跨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中美两国的研究者们开始冷静、客观地反思赛珍珠的文学与文化价值,从而开启了重新评价赛珍珠的大门。1991年1月由江苏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举办的中国首届“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和1992年3月由赛珍珠母校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 Lynchburg, VA)举办的“纪念赛珍珠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Pearl S. Buck Centennial Symposium, March 26-28, 1992),是这一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次盛会^①,标

^① 两次会议的成果均结集出版,即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Elizabeth J. Lipscomb, Frances E. Webb, and Peter Conn, eds., *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 Buck: Essays Presented at a Centennial Symposium, 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 March 26-28, 1992* (Westport, CT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标志着中美两国的赛珍珠研究从此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近20年来,赛珍珠研究在中美两国均取得了长足发展,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专著、译本以及专论或重点涉及赛珍珠的学位论文,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大大超过了此前数十年的研究。江苏镇江赛珍珠研究会在1991年会议的基础上,又于2002、2005和2008年分别召开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①,并将会议论文集结出版^②,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赛珍珠研究的发展。

但综观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人们对作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赛珍珠的兴趣与关注程度明显要高于她的其他身份及其贡献。诚然,赛珍珠首先是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创作成就备受瞩目本身无可厚非,但赛珍珠与其他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一位集高产和“多栖”两大特征于一身的作家,一生总共为读者奉献了107部作品(许志民2002:文艺副刊),“……写得不比我们的最好的作品差,但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得多得多”(徐迟1992:131),而且体裁涵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传记、自传、翻译(中译英)、儿童文学、散文、新闻写作、诗歌等”(彼德·康1998:3)。除了作品文类的多样化,她的多栖性还表现于她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毕生致力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除了用手中的笔着力描绘文化融合的美好蓝图,更是身体力行地通过主办《亚洲》杂志、创建东西方协会及赛珍珠基金会等组织来践行自己的文化与人道主义思想,并在反战、反核、争取种族平等和妇女解放等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这样一位在多个

① 主题分别为“纪念赛珍珠诞辰11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赛珍珠113周年诞辰日”和“纪念赛珍珠获诺贝尔奖70周年”。

② 前两次会议的成果分别是:许晓霞、俞德高、赵珏主编,《赛珍珠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许晓霞、赵珏主编,《赛珍珠纪念文集(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08年会议的成果截至本书撰写之际尚未出版。

领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人开展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她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几部获奖作品,视阈至少过于狭窄,而且也容易导致研究结论的失真与偏颇。

就翻译而言,赛珍珠耗时近5年完成的《水浒传》英译本,是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在英语世界甫一推出即荣登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排行榜(龚放、王运来、袁李来 2000:230-231)，“销售情况好得不可思议”(Conn 1996:159),而且多次再版^①,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很多高校的中国文学课程介绍《水浒传》时的指定读本之一。然而赛译水浒在学术界的遭遇却与其现实影响及接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相对于赛珍珠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热潮,人们对其《水浒传》英译的关注明显要少得多;另一方面,数量与规模上的不足又直接影响了赛译水浒研究的质量^②。要解决这两大问题,首先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文本研究(包括原作与译作、不同译本之间的全景式平行研究等),在此基础上对赛珍珠的翻译策略与艺术进行归纳并探索其理据,进而达到拓展翻译研究视阈的目的,这也是推动赛译水浒研究自身走向成熟的翻译研究本体论要求。其次,赛译水浒研究必须融入赛珍珠研究的宏观体系,成为后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样既可以寻求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丰富和完善翻译研究的内容及方法,又有助于将赛珍珠的翻译策略与艺术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之中,探索其

① 据郑公盾和王丽娜的研究,赛译水浒自1933年出版之后,又于1937、1948、1952和1957年由其他出版社再版或翻印,参见郑公盾,“《水浒传》在国外的流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筹)编《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第239页;王丽娜,“《水浒传》在国外(上)”,《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1998):第69页。但实际上这只是规模较大的几次再版,其他小规模翻印次数已无从统计,例如1939年Grosset & Dunlap的翻印版即未纳入前两者的统计之中,参见Harry A. Domincovitch,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English Classroom,” *The English Journal* 32. 1 (1932): 21。

② 关于赛译水浒研究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二章的介绍与分析。

对翻译理论、汉英对比研究以及后殖民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交际的启示与价值(例如对我国当前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借鉴意义)。笔者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试图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出发点,揭示作为译者的赛珍珠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其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以及赛译水浒的时代与文化意义等,从而丰富和拓展赛珍珠研究的内容与视野,并为汉英对比、翻译研究及汉语国际推广等领域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以此为出发点,本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丰富译者研究的内涵、弥补当前赛珍珠研究领域之不足。当代翻译研究的对象日益由客体转向主体,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译者的参与及作用。译者在文本操控、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的主体行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但其复杂性往往与研究价值同在,尤其是在译者尝试颠覆主流翻译规范时更是如此。赛珍珠作为译者的价值,也正体现在她对居于中心地位的译入语规范的反抗。将她的特立独行的翻译行为与其个人背景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观照,有助于客观合理地解释其翻译行为、考察译者主体性的理据及翻译的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译者主体性的普遍规律及作用原理,从而丰富译者研究的内涵。另一方面,对赛珍珠的翻译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更完整、全面地认识赛珍珠的价值,使人们不仅可以领略作为作家与社会活动家的赛珍珠的风采,更能看到她作为翻译家的重要贡献。赛珍珠集创作与翻译成就于一身,其文学文化观与翻译观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因而对其翻译艺术与翻译观进行系统的梳理也有助于全面理解其文学与文化观(反之亦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前翻译研究既是赛珍珠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同时也是弥补后者现有研究存在的向度单一、视野狭窄等问题中的一个理想

的切入点和突破口^①。

其次,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翻译史学和翻译理论价值。按照皮姆(Anthony Pym)的观点,翻译史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social causation),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是作为人的译者(human translator)(Pym 1998/2007: xxiii-xxiv),因此译者的个人背景及其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翻译史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研究赛珍珠的翻译行为与艺术,既可以丰富译者研究的内容,也是翻译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赛译水浒研究领域存在的道德评判倾向,一方面是研究者受传统文论的学术话语模式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史料挖掘不够也有很大的关系。以书名为例,赛译水浒面世之初,其英文书名就受到过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批评,尤其是鲁迅的一句“便不确^②”,成为后世批评和否定赛译水浒者最常引用的“至理名言”;而支持者则往往搬出赛氏译序对译名的解释,称“这样可以充分而深刻地表现这群义盗的气魄”(Buck 1933/1948: xxi),并联系赛珍珠的儒家思想渊源及一些翻译学和文化学理论(如多元系统理论等),以论证译名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争执双方采取的大都是经验联想乃至情感式的论证方法,从这一点来看,双方又是何其相似!实际上赛氏晚年就水浒译名还发表过“最新”意见,称“译名是出版商提出来的,我极不情愿地、错误地同意了,因为他坚持认为美国人可能看不懂中文书名”

① 郭英剑针对赛珍珠研究领域的问题,呼吁“宏观评论的理论化”和“微观研究的深入化”,提出“应该拓宽视野,将研究方向触及赛珍珠的更多作品之中,改变目前‘结论较多,文本研究不够’的局面”。参见郭英剑,“赛珍珠研究:新问题与新走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95):第80—81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赛译水浒研究当可有效补充赛珍珠研究领域的某些不足。

② 鲁迅是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提及赛译水浒译名的:“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8页。

(Buck 1972: 74)。赛的传记作者彼德·康也曾提及这一点(Conn 1996: 404),但似乎直到最近才引起极少数研究者的注意(如顾钧 2007: 284;唐艳芳 2007: 81)。当然,赛珍珠晚年的意见并不代表权威的学术结论(因为它同译序一样,都是赛的个人言论),也不一定能终结译界的相关争执,但如果研究者能够本着历史的态度将其完整、客观地呈现出来,则至少可以帮助后来者了解问题的全貌,避免主观臆测导致的观点偏颇,这对赛译水浒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且从长远看,丰富翔实的翻译史料和客观中立的史学研究态度也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译论研究如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就必须有人超然物外,不忧不乐,冷静、中立地观察和分析世间的翻译现象”(张南峰 2004: 41)。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完成于“西学东渐”的近代中国,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流一边倒的时代,汉外翻译的数量与规模远远无法同外籍汉译相媲美^①,从而导致后世翻译史家对这一时期汉籍外译情况的语焉不详乃至谬误之见。国内迄今为止出版的翻译史专著凡 18 种(李德超 1998/2007: vii-viii),但其中研究我国 20 世纪前半叶译介情况的著作多为“外籍汉译史”或中国传统翻译史论;唯一的一部《汉籍外译史》介绍此间汉外翻译情况的篇幅也远不及其他时期(马祖毅、任荣珍 1997)^②,这本身就已经部分地说

① 根据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卷十第 355—379 页关于翻译一节的介绍,1917—1927 年间国内出版的译著(含个人著作及选集等)共达 451 种之多,其中 102 种译自英语国家,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 481 页。而根据美国《书评文摘》杂志(*Book Review Digest*)的统计数字,大致在同一时期(1917—1926),美国出版的中国题材小说为 22 种、非小说类书籍 141 种,共计 163 种,参见 Charles S. Braden, “The Novelist Discovers the Orien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7. 2 (1948): 167-168。后一组数据(尤其是非小说类书籍)是否包含翻译作品不得而知,但当时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不对等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② 但该书并非编年史,而是以文类/著作为经、译介情形/目的国为纬,因而关于 20 世纪前半叶的汉外译介情况只能根据其介绍内容作大致判断。

明了问题。关于水浒英译情况的介绍,除《汉籍外译史》有所涉及之外,另有2篇专题论文(郑公盾 1985:233-243;王丽娜 1998:63-71),但三者不足之处大同小异,某些方面甚至连错误都雷同。例如,三者均将水浒另一位译者杰克逊的英文名误作“J. N. Jackson”(郑公盾 1985:239;王丽娜 1998:69;马祖毅、任荣珍 1997:263,380),而正确拼写应为“J. H. Jackson”;其中两部/篇文献称英国译者 H. S. 的节译本是水浒前 19 回关于林冲的故事(王丽娜 1998:68;马祖毅、任荣珍 1997:263),而实际上该译本选的是鲁智深的故事,所据原文内容按七十回本为第 2—7 回,其他版本为第 3—8 回,译文是被译者任意拆分成 19 回的(Irwin 1953:94-95);关于赛译水浒的情况,三者除了转述赛珍珠译序的部分原话之外,就是诸如“风靡一时”(郑公盾 1985:239)、“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王丽娜 1998:69;马祖毅、任荣珍 1997:380)以及“西方评论界一般认为,这一译本对原文有所删削,译文流利可读,但在传达原文风格方面却是失败的(不成功)”(*ibid.*)之类的空泛描述,并无更翔实、深入的研究。鉴此,对赛珍珠翻译行为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可为这一时期的汉外翻译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史料补充,帮助读者形成更准确、全面的认识。

作为个案研究,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不在于纯理论的探索或建构,而是利用翻译学、文学、文化学等领域已有的理论及视角,对赛珍珠的翻译行为与策略进行科学的阐释;但这种阐释并非单纯用后世的理论解释前人的实践,更不是用前人的实践来证明当代理论的正确性,而是立足翻译过程及译文的全面考察,探索译者主体性及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揭示翻译的文化意义,并为翻译批评提供建设性思路与视角。本研究虽然主要从权力与意识形态、主体性以及差异性等后殖民主义文化与翻译理论角度来探索赛珍珠的翻译理据以及赛译水浒的理论与文化价值,但针对后殖民理论体系中某些过于偏激的思想(例如“新殖民主义”倾向),则坚持批判和“扬弃”的原则,去伪存真,在继承的